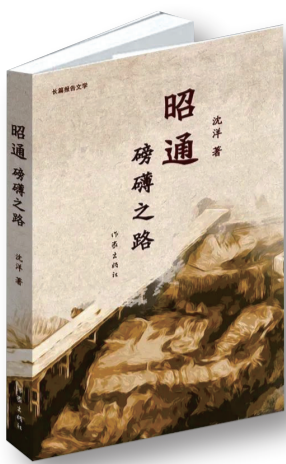




# 向着乡村振兴迈进

——读沈洋长篇报告文学《昭通：磅礴之路》 □张 陵



作家沈洋长期深入昭通改革开放第一线，体验基层脱贫攻坚的生活，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讴歌时代的好作品。长篇报告文学《昭通：磅礴之路》就是他新近取得的又一重要创作成果。作品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笔调展开了一幅历史与现实的画卷，讲述了地处乌蒙山的特别贫困地区昭通人民怎样与贫困作斗争、走向共同富裕的幸福之路的故事，反映了昭通人民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敢啃硬骨头，打赢脱贫攻坚战，敢啃硬骨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强意志和时代风貌。2020年的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昭通：磅礴之路》则以鲜明的问题导向、精准的现实反映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而成为同类题材创作中的一部出色之作。

《昭通：磅礴之路》对昭通地区贫困的严峻性有着深刻的思考。实际上，昭通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城市，大量商品的聚集和商贸云集曾经一度带来经济出版的繁荣。然而，作品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昙花一现的繁荣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整个地区的贫困状态，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人民生活的贫穷状态。当茶马古道成为历史、繁荣的烟云散去的时候，人们才发觉，什么也没有改变，落后还是落后，贫困还是贫困，只留下一一种关于繁荣的传说与梦想。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贫困才能真正摆脱和根本消除。尽管改变贫困的工作十分艰巨，但党和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断加大投入，建设许多项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地区落后状况。进入新时代，中国摆脱贫困进入攻坚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贫困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昭通人民终于用自己的力量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迎来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繁荣的时代更加繁荣和幸福的新时代。事实证明，只有这样一个自觉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执政党，才能领导人民真正摆脱贫困，才能创造真正的繁荣。作品由此建立起作家的鲜明问题

导向和清晰的主题立意，客观和正确认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社会繁荣与人民富裕的关系，把握了正确的历史观。

《昭通：磅礴之路》问题导向的延伸显然是对正在实施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摆脱贫困的攻坚实际上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广大农村摘掉贫困帽子之后，必然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才能巩固摆脱贫困的成果，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幸福之路行稳致远。实际上，乡村振兴面对的问题更多，矛盾更复杂，任务更艰巨。作品虽然还没有把写作重心落在乡村振兴上，但在思考中，这个衔接意识已经相当明确了。正是这个意识，作品有意把描写的重心放在昭通地区重要的易地搬迁安置点上。磅礴之路，就是乡村振兴之路。

据作品提供的资料看，昭通在这些年拼尽全力，建成全国易地搬迁规模第一大、第二大、第四大的三个跨县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让贫困群众一步从原始生存状态跨入新时代直过式的幸福生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也可以说是贡献了脱贫攻坚一个独特的“昭通经验”。早在上世纪末，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领导闽宁对口扶贫工作时，曾具体支持指导宁夏闽宁镇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易地搬迁经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摆脱贫困”的思想深刻指引中国的脱贫攻坚，“闽宁模式”也得到创造性推广。昭通易地搬迁经验，正是践行总书记的思想，按照本地脱贫攻坚的规律，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抓住了主要矛盾，开创了新局面。作品重点写扶贫工作中的易地搬迁，也是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昭通的决策者们敢于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易地搬迁行动，把困难群众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大山里搬出来，安置到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城镇社区，不仅是造福百姓，更是体现出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这意味着，党和政府把困难群众

所有的困难都扛在自己肩上，不能让他们再次沦为城镇的贫民和弱势群体，必须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也就是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个工作可能比搬迁更为艰巨、更为长远。作品真实细腻精准描写了动员搬迁以及搬迁后的各种问题和新的矛盾，如老百姓不会开电梯、不习惯上电梯上厕所、把鸡鸭养在卫生间里等。还有一些陋习无法改变，如一些男人经常酗酒等。这些细节反映了困难群众搬迁后的心理负担和精神焦虑。应该说，最大的焦虑还不是如何致富，而是在具体生活的稳定上。现在突然要搬迁到别的地方，自己没有了生存的技能，怎样把生活继续下去，就是他们焦虑恐慌之所在。作品中说的“稳得住”首先就是要想办法消除这些心理负担和精神焦虑，稳住了生活，事关安置的成败、脱贫攻坚的成败。我们的社区工作者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细致做工作，精心帮这些困难群众出点子安排工作，争取经济收入，把日子过好。这些工作，如果没有责任心、没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根本无法做下来。几十万易地搬迁过来的群众的命运，通过社区共产党员和志愿者的努力工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为创造生活的强大力量。

《昭通：磅礴之路》显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易地搬迁的社区群众的“能致富”，同样事关正在衔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他们也应该成为乡村振兴受益者，应该融入到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成为生活的创造者。作品描写了社区党组织在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积极布局，探索建立一整套有效可行的机制，借助昭通产业的优势如种苹果、种土豆、种种子、种花椒等，帮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不掉队、跟得上、能致富。实际上，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在作家采访描写中，我们注意到这些易地搬迁的安置社区老人多，这就涉及养老体制建设的问题；社区各种病人多，就涉及医疗体制建设问题；由于贫穷，女人离家出现的现象很突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因此也就相应产生了社会建设、教育建设、文化建设等问题。可以看出，作品的问题导向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抓得准、抓得实、想得深、看得清。

作家的创作思路很清晰，那就是以小见大，一滴水见出太阳的光辉，从群众这些小事中折射大时代、提炼大主题。实际上，易地搬迁群众的生活没有小事，每一件都连着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大事，都连着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大事。把群众生活的事办好了、办好了，人民群众就会真心拥护党，就会自觉跟党走。这就是作品主题深刻之处。

## ■ 三味斋

# 写一部和我“无关”的小说

——《锦上》后记 □甫跃辉

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写一部有关彝族刺绣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我仍然深陷在让我倍感煎熬的长篇小说《嚼铁屑》里。考虑了一阵，我决定去写这部和我的个人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的长篇小说。历史上的很多小说，离作者的个人经验其实都挺远的。我也尝试一试，在小说里完全离开自己的影子，是怎样的写作体验。

结束上海书展的活动后，我动身前往楚雄。首先要感谢能给予我这一段长假期的赵丽南老师。这一路上，我得到太多云南朋友的帮助，要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的赵虎总编辑和云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的李寒松老师，还要感谢给我们开了好多天车的陈师傅。到楚雄当地后，首先要感谢的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文产办周主任，整个在楚雄的行程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也是他陪着我去的。还要感谢当地的众多绣娘和文化官员，他们无一不对彝族刺绣满怀热情。

先去的武定县猫街镇仓房村，见到此行的第一位绣娘李从梅（白彝）。在她家，见到新旧两种公鸡帽，都装饰了马缨花和“老者”，旧的是很贵的，37块钱一片，新的大概是铁质的，一块钱一片；见到红彝乃苏支系从头到脚的全套服装纹样；见到现在新式的彝绣服装；见到外地发来要求绣制的“禾服”（婚礼所用的服装）；还见到珍贵的火草线和火草布，这是用火草叶子背面的一层绒毛搓成的线和织成的布。

然后，前往武定狮子山下，要去见普玉珍老师，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南省绣绣领域唯一的一位。可惜没能见到她本人，见到的是她的女儿普淑敏。当地的雄冠绣绣协会有绣娘七百多人，月收入最低两千多，最高六千多，门店每月零售额二十万。听淑敏介绍她母亲的几件绣品，比如双全绣、武定狮子山有名的牡丹花。一张青花龙凤聚会，全长六米三，宽一米八，绣了两年多，画面之精美大气，真是让人惊叹。之前有一幅比这短的十二生肖图，卖了16万元，不知这幅能卖多少？淑敏却说，这不能卖的，要放到博物馆里展览。在淑敏的店里，我仔细对比了手工绣品和机器绣品，手工的比机器的精致很多，价格自然也差异巨大，

我一直觉得做电视批评的人，相较于电影批评，很多工作会显得“不可见”。人们熟知于影评家的角色，而电视批评所处的身份却并没有那么“耳熟能详”。于是那些坚持不懈做电视批评的人，我总是有些心有戚戚地钦佩的，于是会引而为精神上同道之人而珍之。当拿到何天平的这本继《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之后的《观看之外——当代流行影视文化观察》时，颇有些见猎心喜，急急地就翻看了一遍，虽然有很多文章此前就有拜读，依然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作为电视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能国内为数不多的人将电视批评作为一项事业在做，并且能够总结成书，也多少有些作为共同体一员的欣喜。

在本书中，作者透过以电视剧、电视综艺、电视纪录片为主的文本，揭示或讲述了“观看什么”和“如何观看”的问题，勾连了电视文本与电视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层小闭环；同时又将电视这种文化形式与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发展进行了连接，形成了第二层闭环、两个闭环之间的关联与问题的解决，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批评追求和作为一个电视批评家的学术探索。

“观看之外”如果可以称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等的发展对于电视这一行业的影响和作用的话，那么所带来的方方面面自然会影响我们的观看之道。于是乎科技真的改变了我们的收视习惯和收视方式，剧集、综艺、纪录片早已不仅仅属于电视机，因其文本的内涵及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对的，剧集、综艺、纪录片也不再局限于依托电视台播放的单一“线性”逻辑，拖播、倍播乃至全部原档释出的“网飞”模式，都让“观看”变得自主、自由而又难以把握。而这中间所呈现的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对于电视资源的获取、观看方式和行为也呈现了极为不同的态势，所给予的似乎是对电视批评者更加严重的挑战——适应这些、了解这些、把握这些，最后用文字呈现这些，当然要



# 从“观看之外”看“观看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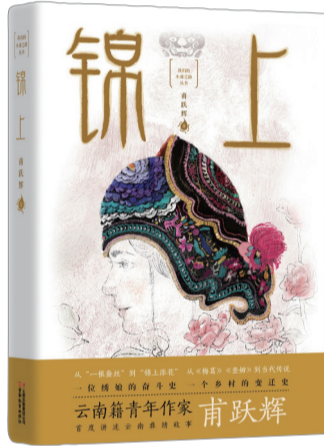
□吕 鹏

让读者信服这些。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用《观看之外》这本书，很好地对这些作了回应，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的脉络，这对一个青年电视研究者而言十分难得。

而相对的“观看之内”，则要回到电视批评家的主体性考察。以我目所能及之处，近年来轰轰烈烈繁花似锦的影视剧、创制和生发了众多电视批评人物与组织，大体有三类。

第一类是伴随着影视业的火热，为了满足观众更迅速的消费需要而产生的大量影视媒体公众号。这些公众号以文字或影像的形式，将电视和网络视听批评极大地普及化，大体上承担了为更多元和多数的受众在海量的视听内容中进行筛选、把关和介绍的任务。于是乎，因为这些公众号与背后运营它们的群体的出现，使得电视批评的从业人群基数实现前所未有的扩大。不过这种基础性的或者简单基于评判式和介绍式开展工作的从业人员，似乎尚没有足够的沉淀上升到更为专业的批评家地位。

第二类则是跨界与兼顾者。文艺批评是个大的概念，实则是因为文艺作品的概念和范畴太广的缘故。做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的专家学者或批评家，虽然有着自己的理论脉络和路径取向，但因为电视这种大众化的媒介形式与表达，似乎谁都可以参与一下，因此也有不少跨界而来或兼而有



最后，还看了楚雄州规划馆和十月太阳历展示馆，越发觉得彝族文化悠远精深，不是这么几天就能了解清楚的。

行程至此结束。我有点几厘不清头绪，该如何来讲一个有关彝绣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文化的传承、生活的挣扎，也有脱贫的故事。上海嘉定区多年来对楚雄州进行帮扶，楚雄彝绣的大发展有上海的很大一份功劳，更有一个古老民族走入现代生活、进入世界视野的艰难历程。我让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朋友将我送往一间无人知晓的小屋，开始这部长篇的写作。

这无疑是非常艰辛的过程，也是非常奇异的过程。在我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实在前所未有。我要讲述的故事，看似和我“无关”，只有故事发生的那片土地和我有关（和我的故乡保山类似，楚雄也有着差不多的山河），但我意识到，有些故事看似跟写作者相距遥远，但真要写好了，任何作品和作者都是血脉相连的。

我要参考大量有关彝族的文献，要力图进入这一古老民族的肌理，去看他们在整个历史的图卷中描绘出怎样的传奇。《梅葛》《查姆》《阿鲁举热》等彝族长篇史诗，都是我一再征引的材料；有关彝绣的各种传说故事，也是我重要的写作源泉。另外，作为一个对刺绣和服装一窍不通的人，我还不得不查阅大量有关彝绣和彝族服饰的书籍。

只要不落雨，那一小片光，总是让我在紧张的写作后得到片刻抚慰。

我要感谢云南这间无人知晓的小屋，以及一直给我做饭的朋友。没有这一切，就没有一个月后小说完成后那无可比拟的幸福。这样的幸福，真是难以言说。不用等到以后，从现在开始，我就已经无比怀念在小屋里度过的这一个月，这一个月宛如一盏路灯，会长久明亮在我写作的道路上。

对我来说，对云南的书写，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今后我会把更多目光投向这片奇异的、和我血脉相连的土地。

之的电视批评家出现。然而囿于原有的批评形式所形成的惯性，改行或跨界而来的批评作品虽也有亮点之处，虽也有一些有影响和知名度的作者出现，但更多的可能是呈现出水土不服，盖因电视的批评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而这也是需要训练与体悟的。

第三类则是持续深耕电视批评创作的群体。我的这种随意而又任性的划分，并不是有什么领地意识，似乎一亩三分地不得外人染指一般，而只是觉得电视批评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也是觉得对于像本书作者这样一以贯之地进行电视批评的人应给予应有的鼓励、重视乃至尊重。作为一种大众的文艺形式，电视一方面勾连产业，一方面勾连平台，一方面勾连观众，一方面勾连社会生活。虽然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但是电视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几乎最大形式上能够集成社会共同体的形式。而在此过程中，并不显现而又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电视批评家则可将其基本的四个方面串联起来。于是，电视的批评不单只是电视文本的批评，更加延伸到其他几个方面，则是“观看之内”所应关注和开拓的如作者所谓的“观看之外”了。唯此，才是作为一个电视批评家的专业体现。

回到这本《观看之外》，作者用“个案深焦”“类型启示”“现象探究”和“文化思考”四个方面将其近年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流行影视文化的思考，从微观到宏观进行了分类批评和研究思考，行文之中每每有亮点浮现，也给予人启发，颇值一读。期冀本书能从“观看之内”给予人们更多“观看之外”的思考和研究，从而使电视研究焕发更多批评精神和理论力量。

## ■ 百家品书

我对吴文莉及其书写移民族群的三部长篇小说尽管都比较熟悉，也就此写过一些文字，但对这三部小说所赖以构成的知识谱系与吴文莉作为“70后”城市女作家的身份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些好奇。因为自从世纪之交“70后”作家登上文坛以来，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群书写城市时尚文化，书写身体、隐私与感官体验的另类作家。而来自陕西的这位“70后”城市女作家吴文莉，却用了近20年的时间，在执着地书写120多年来山东、河南难民流落陕西关中的移民史，其中充满了苦难、饥饿、病痛、死亡，以及求生的挣扎与奋斗，而且写得又如此生动、逼真，触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那么，支撑这种书写的知识谱系是如何与一位“70后”城市女作家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位怎样的70后城市女作家？

我一贯认为，小说作家的叙事不仅需要天赋和才情，更需要知识和经验的支撑。因为作家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在特定地方、特定时间、特定行业发生的，而这些特定的地方、时间与行业又是由必须深度认知、体验的知识和经验构成的。这些知识和经验便是故事发生的基本语境。小说作家尽管有着虚构的合法权力，故事及其情节是可以虚构的，但虚构是不可以虚构的，而且，小说中知识的真实程度，标志着作家的写作诚信和艺术伦理。因此，当一个作家要讲述某个故事时，首先必须深入研究，习得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时间和行业的相关知识，并形成讲述这个故事所必需的知识谱系。作为吴文莉前辈的陕西作家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前，不仅有着从小在陕北生长的苦难经验，本就熟悉陕北的地方性知识，而且为了更加深入地习得他所书写的那个时间段内的时间性知识，他一张一张地翻阅了每一期《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竟至把指头磨破；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为了获得民国年间的地方性知识和时间性知识，仅查阅小说和相关历史文献就用了几年的时间；贾平凹小说中呈现出的秦岭大山里山民生活的特殊知识，以及秦岭风物志式的书写，同样可以看出作家经年累月对秦岭人文、自然等地方性知识的习得、积累与深度体验。

同时，一个作家的知识谱系本来就不是由普遍性知识构成的，而是由特殊性知识构成的。文学写作本来就是对于特殊性知识的书写。这种所谓特殊性知识主要便是指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和科学实践哲学概念，国内外都已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文学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还要特别提出另外两种特殊知识的概念，即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在国际语境中是指非西方的或非现代性的、某种民族性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在中国语境中，是指区域性的、由方言表达的、某个地区或族群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这种知识不仅在人类学研究、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而且在文学写作中尤其重要。事实上，几乎所有文学名著都是由地方性知识构成的，都是一种方言写作。

时间性知识不等于历史性知识。我们都知道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是用来演绎力和权力的关系的。除了司马迁那种“无韵之离骚”式的“史传体”历史叙事（同时也是文学叙事）外，历史知识很少涉及普通人群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而时间性知识则是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由普通人群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构成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类型。

行业性知识更是一种特殊性知识，是只在特定行业内才能存在的、对行业外人士来说完全陌生的专业知识类型。譬如，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彦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梨园行的特殊性知识构成的。如果不熟悉梨园行的知识，就不会有《装台》《主角》和《喜剧》。

或许是由其特定的书写对象决定的，吴文莉小说的知识谱系可谓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行业性知识的一次聚合。

吴文莉小说知识谱系中的地方性知识包括河南、山东和陕西的大量风物、人物个性、习俗和生活方式。《叶落长安》中河南人与陕西人生活习俗的差异和融合得到了大量展示，如对陕西的“胡辣汤”和河南的“胡辣汤”的不同精细描写，以及大量河南人经由河南移民郝玉兰的烹饪绝技和舍命经营，爱上了河南的“胡辣汤”等一系列书写；《黄金城》中，被贬到河南乡下没吃过馍的刘兰草，用对西安城各色名小吃的精细回忆和讲述，来让自己的儿子毕成功抵御饥饿的折磨。

吴文莉小说知识谱系中的时间性知识，包括了19世纪末期以来120多年的时间段内，河南人、山东人、陕西人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涉及晚清时期的灾荒、花园口决堤中河南难民的生存境况、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安城东门外外的生活情境、“文革”中的城乡社会样貌和世态人情、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城内移民族群的发家史等，由几个大的时间节点上的知识构成。三部小说中，每一种时间性知识的书写都经过了作者从大量文献和老一代移民的口述实录中求证，经过了作者设身处地的感知、体验和想象力的过滤，因此真切可感。

吴文莉小说知识谱系中的行业性知识，涉及生意行、餐饮行、梨园行、佛教、农事、中医、木匠等许多行业的特殊知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对每个行当特殊知识的习得、体验与书写都到了“行家手里”的程度。这其中自然暗藏了作者大量不为人知的直接或间接学习的艰辛。

从学理上讲，小说写作的难度与深度，不仅在于对所谓本真历史和必然规律的揭示，也不仅仅在于艺术和审美上的天赋与才情，还在于作家建构属于自己的特殊知识谱系的艰辛，以及对这种知识谱系的书写和呈现。如果说，对本真历史和历史规律的揭示，以及艺术和审美的天赋与才情是一部小说的光彩与灵魂的话，那么对特定知识的书写则是一部小说的实体、躯干和血肉。试想，如果连实体、躯干和血肉都没有，何来光彩与灵魂？如果一个作家只能把握住光彩和灵魂，那他可能是一个诗人或者哲学家，是写不出小说来的。吴文莉用密集甚至有些超载的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及其对这些知识的深度体验、极限体验和“小叙事”方式，扎扎实实地书写出两个移民族群和一座城市、一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并由此升发出陕西、河南、山东这些中华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所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光彩和灵魂来。

同时，吴文莉这样一位“70后”城市女作家的身份，通过在西安的河南移民族群、在关中各地“山东村”中的山东移民族群中生活、学习、交流、观察和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的阅读，习得并深度体验了本不属于她的这些地方性、时间性和行业性知识，也本身就诠释了一个特殊的“70后”概念——“陕西70后作家”，从而也终结了人们关于“文学陕军断代”“陕西没有70后、80后代表作家”等种种担忧和关切。

陕西的“70后”“80后”“90后”作家，本身就生长于一块文化厚土和重要文学传统的聚集之地。他们既具有这个全新时代应有的精神视野和文学观念，又延续着前几代文学陕军形成的“陕西经验”，正在成为一个像刘震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道路，又具有新锐的文学观念；既与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又具有现代体验和现代精神；既可以写苦难、写饥饿、写农事、写中医、写宗教、写戏曲，又可以写城市、写时尚、写新时代，显著区别于文坛上其他区域的“70后”“80后”“90后”作家群体，并以此标志属于自己的知识谱系、文化气质和精神个性。吴文莉是其中的一位，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吴文莉小说的知识谱系与「陕西七〇后现象」 □李震